

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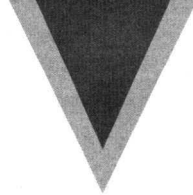
女性社会学的 本土研究与经验

Women's Sociology de Bentu Yanjiu yu Jingyan

主 编 王金玲

副主编 赵 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下册

女性社会学的 本土研究与经验

主 编 王金玲

副主编 赵 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王金玲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ISBN 7-208-04139-3

I. 女... II. 王... III. 妇女学:社会学

IV.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191 号

责任编辑 虞信棠

特邀编辑 宋慧曾

封面装帧 邹纪华

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

(上、下册)

王金玲 主编

赵捷 副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5.25 插页 4 字数 635,0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7-208-04139-3/C·127

定价 80.00 元

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文化阐释

一

当今,传播中的话语研究作为媒介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关注,其研究课题也涉及到传播学的各个领域。比如男女两性阅读是会存在差异的,“女人的经验,将会引导她们从与男性不同的角度来估评作品,而男人们对女性读者聚精会神的问题往往是索然无味。”(卡勒,1998)话语研究可以作为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女性话语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男性话语,因而一切谈论女性话语的问题都绕不开男权中心主义。这里,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重要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入手的。我们分析中国大陆传播中的女性话语,也是除言语之外重点立足在她们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是从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深层心理因素去探索问题的症结。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传播中的女性话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为:误读、偏移、取悦等现象。这并不在于中国男性文化如何强大,而在于女性视觉对这一问题的立论偏颇,认识上的误置。本文拟就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索。

二

对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研究,本文想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组进行。非虚构性的是指新闻报道、娱乐业、广告等传播中的女性状况;虚构性的则指文学作品、影视文化、绘画设计等与创作相关的传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

虚构与非虚构已构成传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语境,也是中国女性主义全部的直接现实。因为中国没有以女性主义为中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不涉及从运动、事件等概念谈中国的女性话语。同时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的波芙娃、伍尔芙、克里丝蒂娃那样强有力的文学女性的代表;也没有具有国际影响的女性文学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此,我们在谈女性话语时显得异常困难,这种无直接实例,又无参照系的讨论便会显得空洞,力量不足。

习惯性的说法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女性居于什么位置决定女性的权利。用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权藩篱中解放出来取代男权的中心位置来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阅读中的误读。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不能说武则天、慈禧时代就是中国的女权时代。

另一种误读便是不少人针对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女权,指认凡谈女权便强调女性生活形态的解放,例如认为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烟、喝酒、吸毒、放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男人成为女性的附庸就是女性解放,这都是错误的。

这两种误读对女性主体话语的形成和扩展均带来不利影响。

在中国大陆的新闻报道中,关于女性的报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陈崇山,1998)。据1996年3月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家中央级大报

《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要闻版监测结果发现:在要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 83%,女性仅占 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 71%,女性占 29%。8 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占 26%;8 家报纸要闻版有关妇女的报道,以《工人日报》为多,占 19%(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1995)。这自然可以推测女性话语在中国受到抑制。可是我们看一下美国 1992 年 20 家报纸头版内容分析结果:提及女性的报道为 13%,有女性出现的照片为 32%,女记者署名的文章为 34%(同上)。再看久有女权主义运动传统并富有成果的北欧社会,今天女性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儿童、艺术、教育、消费等“软新闻”报道;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多为男性,并且妇女在传媒的领导阶层的地位也相对较低。北欧传播研究者们将此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杨端明,1998)。

上述新闻媒介中有关女性位置的状况,反映了当代中西方社会,女性均处于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现实。当然地位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实质上进行分析。据笔者所知,在主流报刊系统中,主管者经常有意识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前几年报刊中对军嫂韩素云的报道,对北京公交售票员李素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尽量提高她们的位置,如她们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劳模。在中国政界中,女部长也不算少。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即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是社会运行的一个循环节。这提示我们,如果要改变附属的地位,决定性的是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

这一解决首先是女性话语要从男性话语中解放出来,形成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其次,女性话语要有自立精神,成为一个运

作系统,以体现女性话语的力量。最后,女性话语还应该具有反思批判性,对性别歧视与不平等始终保持警觉。

现实中娱乐业和广告业中的女性话语则更糟一些。在这两个系统中,女性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她们独领风骚,从位置上说女性具有优势,但我们深入分析个中的奥秘便会发现某些问题。娱乐业和广告的动力系统最根本的是金钱,女性用自身的优势换取的往往不是独立、解放,而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报酬。一个走红女星的一次出场费可高达数十万。各种性质的通俗的、纯商业性的或公共关系性的演出,诸如庆典、推销等,没有女星,尤其是走红女星的出场,似乎票房价值和赞助金额就要打折扣。近年来,林林总总的广告也大量选择美女作为诱惑视觉的工具。可见,娱乐业和广告业虽是以女性为主,而潜在的心理因素却是男性中心视觉。以女性为取悦对象的是男性,广告中的美女诱惑的也是男性,这是从男性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策略,这一形式上的女性主导实质上则是女性的悲剧。

因此,在非虚构性语境中,女性话语的重要之处不完全是位置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缺乏、自由奋斗精神缺失的问题,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三

在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危机似乎更加严重。

这里以两部影视剧为例:一部是80年代轰动一时的讲述一个在北京发生的故事:《渴望》,其收视率达到97%,其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女性形象是刘慧芳;另一部是90年代影响很大的讲述一个在广东发生的故事:《情满珠江》,也是一部大众与评论界交口称颂的精品,其间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贞。

慧芳和淑贞两个形象颇能揭示中国女性话语更深层的心理和

中,人情醇厚,与传统文化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贤惠。她在丈夫、公婆、邻里之间游刃有余,处理问题的结果带来的话语环境是安顺、祥和。可以说《渴望》以忍让、宽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女性话语完成了“安定团结”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主题。

《情满珠江》中淑贞的形象或许更意味深长一些。她当知青时被人强奸,有着浓厚的心理阴影。她要取得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认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邻里中显示出一种贤惠形象。即使丈夫最后离开了她,她对丈夫的离异无怨无悔,贤惠依然,且独立抚育孩子;更有甚者,她多次替丈夫解围,承担更大的压力。她在走上了女强人的道路后,还是摆脱不了传统性别文化的规范,致使四面八方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称颂她,最终树立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贤惠女性形象。

这两个形象的精神内核的相同不是偶然的一种巧合,它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男性视觉中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期待,一种理想构造。如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以取悦男子为目的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传统文化最看重的是女性的贤惠,这是一种历史性构造。问题的关键是女性为何愿意把完成这种文化塑造作为己任。这便透视出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无可否认,几千年来,在中国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当下语境也是如此,相对而言,女性话语是受压抑的。

研究女性话语可以说是个结构性话题,即在二元关系中的定位。有研究者在分析《简爱》时,便是从家庭和反家庭的对立关系中提出一个解释。罗彻斯特有一个合法家庭,而他与简要从对立的反家庭状态到相互征服,然后简争取到了进入合法家庭的集团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转换性话语领域。

刘慧芳由平民进入高干知识分子家庭,淑贞由一个小媳妇到一家合资股份集团公司经理,她们都是处于被动语境,慢慢地为自

己的位置而奋斗。她们都有一套特殊的话语策略,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忍让、贤惠。渐渐地,她们在话语领域的地位发生变化,最后移位于话语中心。这一系列过程便是转换性的,其转换机制就是一套话语策略。如果女性有意识地使用转换性话语策略,我们可以认为女性的独立与主导有了良好的开始。但从虚构性语境中,我们只看到这种转换更多的是来自外力的给予,而不是女性内心独立的自主愿望,这样,女人便只是贤惠而不是独立和主导。

这里要揭示的是一个深层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即此间的女性话语中心不是在明确的独立、解放的意识下获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话语策略,用迂回而取悦的方式得到男人的认可,从而获得有限的位置。而在最终完成了话语领域转换获得权力之后,她依然是取悦男人。

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传播中,东方和西方似乎差异较大。如前所述,北欧研究者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女性话语是受压抑被歧视的,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了这一点。而在欧洲和美国的影视中,许多女性形象是独立的,开放自强的。这表明西方社会现实传播主要是男性视角;那些虚构性的女性形象既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又反映了当今时代妇女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并多少也反映了时代的审美特征和趋势。而在中国大陆,虚构和非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基本上是同质的,观念、行为、形象等都有较大的相同性。与西方相比,中国大陆虚构性传播中女性话语的被压抑更严重一些,似乎更多地显示为一种男性视觉。

四

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在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受压抑,是因为男性主流文化的作用,那么,我们只要颠覆男性主流文化就可以了。而这种颠覆最简便易行的便是“女主”当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掌权,但并不能解决女性话语的自由独立问题,可见,这一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一般地说来,如果公开地歧视女性,不仅会遭到女性的强烈反抗,也会受到男性的激烈反对。那么,为什么女性话语还处于压抑状态呢?这就是文化的因素了。以普通的女性命名为例,从非虚构传播与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罗列一串,如:淑、惠、珍、花、贤、美、佳、丽、艳等等,这都是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一种文化构造,而这也可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两性的角色规范及这一规范在两性心中的内化。

再如,传统文化认为漂亮女性是红颜祸水,守节乃是女性道德之首,因此,女性对失节、失贞等性话语通常表示极大的抗拒。如《情满珠江》中的淑贞,青年时代遭强暴一直是她沉重的心理负担,甚至一度都认定自己终身不嫁。显而易见,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国女性影响至深,因而女性要克服来自文化的压力难度更大。

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因素视为一种特别的力量,在个人人格的塑造、自我意识的觉醒中,文化的力量是十分重要的。有一种说法: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即深描的脉络(克利福德·格尔兹,1998)。在社会的变革中,文化或许不是一种直接的动力。但从心理因素、人格因素、价值观思想体系而言,文化的力量又是无所不在的。它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构成行为动因,促成话语论争,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不同于政治或军事斗争的直接冲突罢了。因此,在女性话语的研究中,我们一点也不能忽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卡勒,1998,《论解构》,第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陈崇山,1998,《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在行动》,《新闻记者》第5期。
3. 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1995,《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

告》，《新闻与传播研究》第2期。

4. 杨端明，1998，《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国际新闻界》第3期。

5. 克利福德·格尔兹，1998，《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解读全球资讯网上的台湾 女性网站:由网站话语表现 看性别与科技之关系

一、综 述

随着科技的不断改善与政商势力的积极介入,网际網路(Internet)也开始强调“使用者友善”(user-friendliness)的观念。以图形界面为主的“全球资讯网”(World Wide Web),由于操作简易遂成为网际網路最重要的服务项目。它不仅提供多样化的资讯,而且也招徕了大批的上网人(Harris & Kidder, 1995, 1—4)。

根据近年来的“台湾地区网路(net)使用调查报告”显示,女性上网的人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且与男性使用者的比例越来越接近。^{*} 由于女性上网的人数成长快速,在全球资讯网上,各种类型的“女性网站”相继成立,不但自成一个类属,而且许多大型的网站也纷纷增开“女性”网页,以便抢占女性的网站市场。然而,随着女性网民的增多与女性网站的出现,网际網路是否能够摆脱过去

^{*} 蕃薯藤的《台湾网路使用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地区网路使用人口的性别比例有明显的改变:男女比例已由 76:24 (1996),转变成 68:32 (1997),甚至到 57:43 (1998)。另外,《台湾网路公民趋势系列调查:1996—1998》也发现女性上网人数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已由 32% (1996),成长到 48% (吴统雄、饶培伦,1999)。

“男性领域”(male territory)的嫌疑?

许多国外的女性主义者已经证实,全球资讯网仍是由男性主导;而且它所提供的文化环境,对妇女而言相当不利,不但充斥着各种色情讯息,也刻意强调女性的某些刻板角色(McLaughlin, 1996, 75; Wakeford, 1997, 53)。不过她们也发现,全球资讯网上仍有一股妇女的反对声浪,譬如 Cybergrrl 与 Geekgirl 等女性网站。这似乎说明,在某个程度上,全球资讯网仍可以作为妇女的抗争工具。妇女可以透过架设女性网站,去支援、联系与动员其他的姐妹。N. Wakeford 因而建议性别研究者,应进一步检视全球资讯网上的女性网站,以便了解妇女究竟如何使用与参与新科技(Wakeford, 1997)。

在台湾岛内,目前当局正在努力地推动网际网路的全民运动。然而,若不正视网路所隐藏的性别问题,而天真地以为“科技是中立”的,那么现实社会里性别歧视的问题,可能将会在“网路空间”(cyberspace)里继续扩大与加深。因此本研究认为,若想研究网路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者实有必要检视与反省“性别”与“新科技”之间的关系。

有关性别与科技的研究,过去女性主义者总是围绕着相同的主题——“科技是男性文化的产物”——打转。结果也一再发现,男人可以接近并利用科技取得权力与控制;女人则被剥夺这方面的能力(Wajcman, 1991)。此研究取向,虽然有助于我们了解女人与科技疏离的原因,但却无法回答,假如有更多的妇女参与科技,是否就能改善性别不平等的现象?* 这是因为此类研究取向视“性别”与“科技”为既存的(given)概念,以至于容易将男性特质(masculinity)与科技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连结(ideo-

* 有些女性主义者对妇女使用科技一事,并不乐观。譬如:Warnick (1999)在研究美国女性网站的修辞表现时发现,Cybergrrl的网站过分强调科技能力。由于她预料科技能力是属于男性特质,因而她认为这些网站的表现,其实是男性化了女性特质(masculinize the feminine)。

logical link),进而归结出,男人容易接近和运用科学知识;女人则否,故此取向无法看出“性别”与“科技”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 S. Ormrod 与 M. Morse 认为,性别与科技研究应着重于:既存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性别关系)如何形成科技中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性别关系)? 而此关系又是如何被表现在科技之中(Ormrod, 1995; Morse, 1997)? 由于已有不少研究在探讨网际网路的形成(程宗明,1997;郑良文,1997),因此本研究将重点放在后者——网路上展现什么样的性别关系?

尽管目前已有零星的研究,触及网路的性别议题,不过这些研究只是分析几个特定的女性网站而已,而且研究的焦点不是放在新科技的民主特征上,就是讨论网路的抗争用途(方念萱等,1996;黄慧樱,1997;李礼君,1997;郑敏慧,1998)。本研究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台湾的网路性别文化,光是研究几个特定的女性网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因此,本研究将检视全球资讯网上专门服务“台湾妇女”的中文女性网站,以便了解台湾妇女是如何在网路里现身(presence)。在方法上,本研究拟采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去解读这些网站的性别表现与其所运用的策略。本研究希望藉此进一步了解网路科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二、相 关 文 献

1. 网路是女人天地? 抑或男人地盘?

“网际网路”的科技发展推陈出新。早期它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档案传输(file transfer)、电子邮件(electronic mail)与电子公告栏(bulletin board systems)等;使用者必须学习这些系统的个别语言与指令,才能使用这些资源。但随着全球资讯网的出现,由于它能支援其他的网路服务,故使用者在开启 WWW. 的同时,即能享受多种的网路资源,网际网路于是成为各种传播服务的巨大集散

地。它的传播形式可以从两人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到多人在聊天室(chat room)里闲话家常,甚至是某个团体为自己建立网站。M. Morris & C. Ogan 因而宣称,网路是一种多层面的大众媒体(a multifaceted mass medium),它包含不同的传播形构(configurations),能够连结人际沟通与大众传播(Morris & Ogan, 1996, 42)。

由科技层面来看,网际网路具有多媒体、双向互动与使用者取向等特色,使其传播方式不同于旧有的大众媒体。在微观层次上,网路赋予使用者更多的自主与控制权:使用者不但能以匿名的方式搜寻资料,而且也能自由创作与传散讯息(信息),甚至还能以“化名”的方式,进入各种讨论区(Tamblyn, 1997, 42—43; Blackman, 1998, 132—133; Seidler, 1998, 20)。在宏观层次上,网路不仅能作为“公共论坛”的场域——让使用者在网路上畅所欲言,而且它还能形成网路社区(cybercommunities)——让使用者不用通过有形的地点(locate),就能轻易地参与社区的活动(Kitchin, 1997, 149—150)。因此,许多缺乏社会资源的弱势团体,纷纷利用网路去开发与累积资源(Zickmund, 1997)。

网路的科技特性使网路空间博得“世外桃源”的美誉——它与现实社会相比,总是显得更自由、更民主与更平等。有些女性主义学者甚至认为,去掉“层级化”的网路空间,将能成为女人的国度。S. Plant 指称,虚拟现实犹如女人,缺乏阳具与权力,它只是一种模拟,但总是超乎它所想要模仿的对象。Plant 并且以“编织”(weaving)来比喻网路的运作,由于“编织”向来被视为是女人的拿手绝技,因此她断言,能编织出各种伪装物的女人,未来将会在网路上备受肯定(Plant, 1995)。此外, N. Tenhaaf 也强调,网路是一个没有固定认同的“女性空间”(feminine space)。不过她所谓的“女性”,并非指女人的生理性征,或是女人在象征秩序里的负面地位;而是指一种能摆脱二元对立(自我与他者之分)的表达方式。由于网路采用此种表达方式,因此它能挑战“以阳物为中心”的男

正当女性主义者看好新科技的解放潜力之际,一群从事网路研究的学者却有了负面的发现。他们指出,尽管网路允许反叛,或甚至出现较少商业色彩的文化,但网路未必会走向反霸权的方向。这是因为网路的使用,仍有门槛的限制,容易排除低社会经济地位与科技文盲者(technology illiterate)的参与。而且在性别层次上,网路也没有发挥众人所预期的革命效果,反而倾向复制男性主宰的模式(Menser and Aronowitz, 1996, 14; Birke and Hency, 1997, 226; Morse, 1997, 24)。譬如,在讨论区里出现的“女性角色”,她们的语言表达以顺从支持他人为主(Spender, 1995; Dietrich, 1998);而在网站里现身的“女性形象”,则多是男人所欲求的美丽且被动的性对象(Dery, 1996)。由此来看,网路空间的性别表现,其实复制了现实社会里的性别刻板印象。是以 P. Wise 指称,网路的确是女性化的科技,只不过它拥有的是“女人”的负面特质——缺乏与他者(lack/other)。由于网路像女人一样,只是“物件”(object)等着被驾驭,因此网路空间的父权形象,不仅出现在网路上,而且也体现在科技本身。换言之,网路的女性化只是男人用以扩充与维持他们的主体性罢了(Wise, 1997)。

上述的这些发现,在某个程度上已经推翻了网路的乌托邦想法。由于过去的研究,一直以为网路的运作不同于现实社会,乃自成一局,因而对网路的解放与转换能力(Robins, 1995, 146)过度神秘化。其实,网路科技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为了军事与商业的目的才被发展出来,而且它的运作也一直受到物质与社会生产的安排(the arrangement of material-social production)所影响(Menser, 1996, 308)。因此,我们应(de-mytholise)对网路空间及其文化形式“去神秘化”,重新评估它的政治意涵。Kitchin(1997, 167)并且建议采用脉络化(contextualising)分析,也就是将网路空间置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变动的社会脉络里,然后再去检视它的文化表现。

基本上,本研究也赞同 Kitchin 的看法。网路空间无法与现

实社会截然二分,而且网路本身绝非“无性别”的科技。尽管网路的某些表现能够对性别的意涵“去稳定”,然而网路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在网路空间上标签“超越性别”或“性别歧视”就能解决;相反地,这问题涉及一个更复杂的社会过程,必须放在现实的脉络底下去分析。

2. 网路与性别的辩证关系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性别”是网路运作的一个重要面向。然而,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网路作为科技,不只是一套硬件设备而已,它还包含相关的知识(使用规则与技巧)与生产的过程(Terry and Calvert, 1997, 5)。是以,网路不仅能帮助我们生产成品(如网页)、表征与效果,而且还能影响我们对主体性、现实与社会关系的看法。

另外,由于网路的生产制造无法脱离社会的政治经济脉络,因此网路科技的形成也深受社会关系的影响,性别关系正是其中之一。换言之,性别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先“性别化”了网路科技,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网路时,它也可能反过来“性别化”我们,强化既有的性别关系。源于军事工业的网路,它的语言形态与使用方式比较符合男性的阳刚特质,因而网路的程序设计师或使用者多以男性为主(Warnick, 1999, 6)。再者,从异性恋的性别规范来看,“男性特质”等同于“科技能力”,所以男性从小就被鼓励去追求科学知识与技术(Benston, 1988; Cockburn, 1994)。科技能力可以说是男人的一种自我表现,因此与女人相比,男人总显得比较愿意学习与使用网路。S. Turkle 表示,女人拒绝学习或使用电脑,其实是为了实现她的女性特质,因为女人被视为“科技无能者”(Turkle, 1988)。

不过,这里必须强调,“性别”并非指实质或稳定的认同。De Lauretis 指出,“性别”其实也是一种“科技”——专门生产与复制男、女性特质的类目与层级,并赋予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使他/或

434 ■ 她成为男人、女人(de Lauretis, 1987)。不过,“性别”不是静止或